

一条路 （2005年 为研究生院毕业二十年而提笔）

—— 自述

秦朵

1956年11月15日出生于北京

1977年-1981年：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2年获英语学士学位

1981年-1984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86年：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1986年-1989年：就读于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19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9年-1992年：牛津大学奥列尔学院研究员

1992年-现在：伦敦的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经济系高级讲师

1998年-1999年：就读于伦敦大学东方及亚洲研究学院；1999年获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东研究）

2000年：美国道富银行高级计量经济学家（兼职）

2003年-现在：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者（兼职），在经济研究部门从事对亚洲开发银行主要借款国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研究。

.....

在人生的中途，我们都在黑暗的森林中，荆棘中，
在沼泽的边缘，那里没有安全的落脚点
而且受到各种魔怪和虚幻的光明的威胁
引诱你去冒险。别让我听取
老年人的睿智，不如听他们的愚行，
他们对恐惧和狂乱的恐惧，他们对财产的恐惧，
对属于另一个人，属于别人或属于上帝的恐惧。
我们唯一能希冀获得的睿智
是谦卑的睿智：谦卑是永无止境的。

.....

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耐心等待但不要寄予希望，
因为希望会变成对虚妄的希望；
耐心等待但不要怀有爱恋，
因为爱恋会变成对虚妄的爱恋；纵然犹有信心，
但是信心、爱和希望都在等待之中。
耐心等待但不要思索，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思索：
这样黑暗必将变得光明，静止也将变成舞蹈。

.....

我就在这里，在旅程的中途，已经有二十年——
.....，而每一次尝试
都是一次完全新的开始，也是一次性质不同的失败，
..... 只有去找回那已经失去的东西，
但一旦找到又重新失去，又去寻找，
这样循环反复的斗争。.....
对于我们，唯有尝试自己，此外则非我们所能为力。

——节选自 艾略特《东科克》

艾略特的诗，可能代表了这二十年来我的部分感受。

突然要回顾这么多年来生活，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古怪。

说实话，我时常觉得我是这个班级的“局外人”。

刚刚接到这个任务，我首先想起了威廉·德·昆宁的画作。他是二十世纪的一名抽象派画家，美籍荷兰人，擅长运用不同的色彩表现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心绪。他可以用画笔，描绘出一生的感受。遗憾的是我无法在这里展示他的作品。

我没有德·昆宁的本事，如果有，我现在生活的色彩，就如德·昆宁中年时笔下那种平淡的、甚至略有些冷峻的色调，我本不想打乱现在的生活心境，仍这样安安静静走下去。现要回忆这二十年，让我感到有点窘迫，它不允许我淡忘过去，要求我去重忆往事。

一

北京，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是我的起点。1969年，我的家搬到山东东营胜利油田，我们是随同石油学院一同搬迁的，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读完了中学。

在山东，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苦难与无奈。眼前的景象让我头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彻头彻尾的贫穷”，农民家十几岁的孩子们赤条条地，见到什么偷什么。也是在这里，我时常被人讥为“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主要是因为父母的出身都带“资”字，父亲又是右派，当然也可能有同学嫉妒我学习拔尖的成分。

1975年，高中毕业的我回到北京工作，我的姐姐已经下乡插队了。我在外文出版社下面的国际书店工作，每天给报刊杂志打包，满眼是外文，包装上的地址也多用英文印刷的，这让我不得不每天坚持跟着收音机学习英语。所以，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手边除了英文广播讲座课本，一无所有。我别无选择地报考了英语专业。

其实在这之前，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在学校的成绩也不是很好，我是在第二批录取时被录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我本来以为自己在高考中考砸了，哪也去不了，甚至开始准备参加1978年第二次高考。我的英语并不强，就决心试试物理，高中的物理老师曾经强力劝说我报考物理，而我也因为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感到后悔，中学期间，我在自然科学学科方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高中时，我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记得当时我们学习物理分小组制作收音机，我是唯一“热情高涨”的女生。假期还自己掏钱造了一台收音机，收音机零部件商店常常有一个小女孩跑进跑出，那就是我。经济学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和物理还是有許多相通之处的。

我就这样真的想投入到下一次考试了，这时候，录取通知书居然到了我手里，即便我不去报到，也没有资格参加下一年的高考，很显然，我不想让包装杂志这一乏味的工作充斥我的后半生。我最终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此时学校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了。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的英语水平不太好，在“慢班”里学习。这个开端是我的耻辱，平生头一次，我感觉自己是这么愚笨、这么无知。但是到了第二学年的年底，我赶了上来。那段疯狂的学习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迅速填补大脑空白的快感。

大三的时候，我必须考虑我的未来。当时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分配工作，我的父母都没权没势，我又不善于同上司搞好关系，很难预期分到好工作。在读书方面，我的头脑可能还称得上“出众”，但与人打交道时，恐怕脑袋里就缺这么一根筋，特别是在面对着那些中国式的微妙的、自利的人际关系时。

为了争取有自我选择工作前途的机会，我决定继续考试，争取有机会攻读硕士学位。念什么呢？我虽很喜欢英国文学和政治，但相对而言，我的文学功底还是相当薄弱的，和其他同学人相比，我觉得我所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可能与我的家庭也有关系，文化

大革命及那之后，我的母亲时常阻止我们阅读小说一类的书。自然科学是我的强项，我曾想作一名科幻小说的翻译家，但当时没有这样的学科。经济学就这样成了我唯一的选择，学习经济学是必定要学习数学的，这也很合我的胃口。

还是要再说一遍，能进大学学英语实在是幸运，仅凭我自学，英语肯定难以有什么起色，而自学数学，对我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二

其实我当初报考的并不是计量经济学，而是当代西方经济思想专业，因为我当时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专业翻译。当经济所要我转为数量经济学时，我当时的反映是：“只要不要我再重考就行。”许多年后，我才听说了我被调换的原因，首先，当时招当代西方经济思想专业的导师不想招收女生；同时，报考该专业成绩好的考生超过了规定招收的人数；而且我正好在数学和英语上取得了最高的分数。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是“第二性”而感到如此幸运。

毕业后，我在社科院工作了大约一年半，在这段时间最值得骄傲和纪念的事情，是我生下了我的女儿。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选送访问学者的考试，由于准备仓促，统计学和经济学考得不太好，但 TOFEL 和 GRE 取得了很高的分数。收到 TOFEL 和 GRE 的成绩，我便动力尝试联系出国读学位的心。读研期间，我经常以翻译的身份参加社科院有关经济学的演讲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我接触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如克莱因、列昂惕夫。我对我所掌握的一些数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是很有把握，就请教克莱因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史的问题。他给了我几个经济学家的姓名和地址，这其中包括牛津大学的戴维·亨德利。我给所有这些人写了信，并附上了我的 TOFEL 和 GRE 的成绩单，我的申请在加拿大、美国、牛津都通过了，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数额最高，就这样，我在牛津大学完成了学业。

三

在牛津大学读书，可能是我生命的另一个转折点。当我得知自己是取得了全额私人奖学金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又是第一个进入牛津纽菲尔德学院的中国大陆学生时，有点惊讶。当时在英国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是靠政府提供的助学金生活学习的。

在纽菲尔德学院学习一点也不轻松，但是在学识上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三年后，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是牛津大学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牛津又继续度过了三年，在奥列尔学院作研究员。该学院原是男子学院，以划船年赛之冠而闻名牛津大学。我是他们首聘的女研究员。我到那儿的第一年，奥列尔学院就在划船年赛输掉了冠军之冠，不少教员风趣地将这事归于我的功劳，因为他们希望学院以学术，而不是以体育，优异而驰名。这使我感到很自豪。

然后我便去了伦敦。玛丽女皇学院和牛津大学非常不同，起先我并不喜欢这里，但很快我喜欢上了伦敦这座城市，它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在某些方面甚至和北京有相像之处。在玛丽女皇学院任教，感觉最好的一点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而在牛津读书时，我一直都会有“异乡人”的感觉。

说起我决定留在英国，直接原因是 1989 年那场政治事件。文化大革命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恐惧感，我必须顺应大众而抛弃真正的自我，这令我非常的忧惧，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再次回到那样的状态中去。唯一的安全感，来自于隐匿到一个令自己感到相对自在的地方去，比如伦敦。

而另外一个深深的烙印，来自于我丈夫的去世。他在上海一次事故中丧生。我为此打

了一年多的官司，经历了不少黑暗面。这加强了我漂流在国外的决心。或许我真的是个懦妇。性情即此，就随它去吧。

一年多前，我停薪留职，去了马尼拉，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这之前，我已经在玛丽女皇学院教了十多年的书，已对那种教书生活失去新鲜感。现在在亚行，尽管我很喜欢这里的研究工作，却非常想念伦敦，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声音在呼唤自由与解脱。在这里工作，我最厌恶的是每天八个小时憋在办公室里，还不得不对上司“毕恭毕敬”。

和我最好的朋友顾秀林不同的是，她有着强烈的中国情结，并最终重返祖国。而我，说不清我为什么站在我此时所站立的地方，看不清我的生命将向何处去。

四

我的家庭结构很简单。

我女儿 19 岁，在剑桥大学读二年级。

我的父母都已退休。唯一的姐姐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

五

关于我自己的状态，还有一个合理的类比，来自于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现代喜剧·白猿》，这一标题和一幅中国画有关。画上是一只白色的猿猴，它眼神含一种强烈的渴望：在得到它之前，他不会快乐……但实际上，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渴望的它是什么。我们许多人不正也是象这只白猿一样贪心而可笑吗？

在北二外学习期间，我被一些西方人思考人生的想法强烈地影响着。在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一种令人难忘的人生解读方式：

他将人生喻为“波斯地毯”。生命本身其实本无意义，它本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最终的结局都是走向死亡，而失败与成功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唯一不同的是地毯的图形式样。有人生活得象精美绝伦的波斯地毯，而也有人生活得象平淡无奇的波斯地毯。图形式样的复杂也好，简单也好，只是个人的偏好，并无唯一的评判准则。而人们的满足或不满，大都来源于我们获得此种图案而丧失彼种图案地不甘心，源于我们的白猿本性。

我想，我只是偶然地走上了一条国人看来是略显不平常的道路。从经济学的效用论出发，在大多数人的生命年限同等的条件下，我能经历了更多事情，我不就是活得更值了吗？当然，对那些偏好平淡简单色调的人来说，我可能是活得太累了。

问我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感到一言难尽。可能有点像加缪在他的《局外人》中所描述的那种感觉，只是我还不是那么消极。

用一首诗，作为此次回忆的终结：

未选择的路

[美]弗罗斯特

顾子欣 译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呵，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选自《外国诗》(2)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